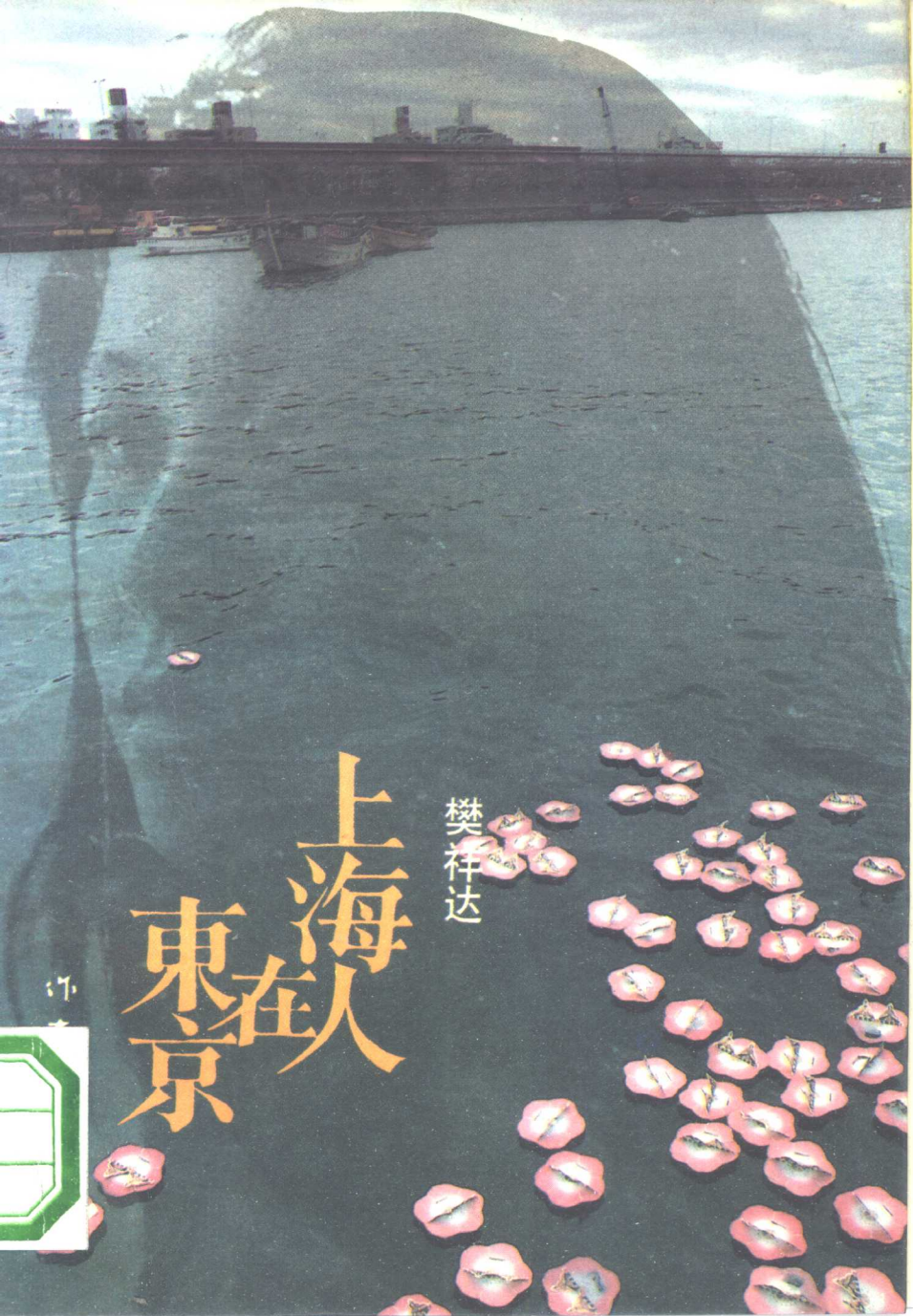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樊祥达

# 上海人 在东京



樊祥达

# 上海人在 東京

作家出版社



## 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### 上海人在东京

---

作者：樊祥达

责任编辑：杨 葵

装帧设计：宁成春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排版：北京市华星计算机公司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215 千

印张：10.5

插页：2

印数：52,001—73,000 册

版次：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37-2/I·536

定价：4.8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巨型飞机离开地面的瞬间，我的整个身躯象荡在半空中似的，失去了重心。每次乘飞机去内地采访，都有这种感觉。但是，今天这种感觉尤为强烈。我紧闭双眸，紧紧抓住座位的扶手，依然无法排遣失去重心的恐惧，浮现在眼前的是云，飘飘忽忽的流云；是海，白浪滔天的大海。

我的茫然和恐惧，大半是一位相交十年的朋友王默带给我的。他是某单位驻虹桥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。通过他，我办妥了去日本东京自费留学的手续，跨进了虹桥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。可是，万没料到，恰是他，使我在未上飞机之前，象掉了魂似地预感到，这次东京之行前途茫茫，凶多吉少。

我是在六辆轿车的护送下来到虹桥国际机场的。车上除了我的妻子林林、儿子冬冬之外，都是我的那些颇有身份的朋友，他们为了朋友的情义，欢送我的离去。

王默也是这样一位朋友，他住在机场附近的宿舍楼。一大早，他已经候在机场。他穿着一套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淡

灰色的铜扣民航制服，胸前佩带机场特别通行证。过了安全检查头一关，他叫我先别忙。当然，我也忙不起来，三只行李箱，肯定超重了，他有朋友在，我还得靠他找熟人，将行李运到飞机上。没办法，平民百姓，出一次国，濒于破产。找找熟人，托托人情，能省则省，管它是循私舞弊还是什么呢。

自费留学生的增多，使机场托运行李的窗口前，排成了长龙。一排排长龙的中间，堆满了行李箱、旅行袋。那是虹桥国际机场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热闹景象。但是，这些自费生大半第一次坐飞机。有的排上队了，却忘了交托运费，又一番鼠窜似地忙碌；有的行李超重了，却没钱支付超重费，求爷爷告奶奶地讨价还价，巴望托运员手下留情；有的办妥了托运手续，把多余的人民币送给候在安全门外的亲朋好友。当然，每一个乘国际航班的旅客，过了“安全检查”这一关，等于出了国门，虽然与亲友相隔才几米，但不能进出，在交接人民币时，都有海关工作人员监督。

“急什么，办不好行李托运，飞机又不会起飞。”王默说。

我为自己有王默这样一位朋友感到莫大的荣幸，莫大的安慰。我站在他身边，仿佛靠着一座山那样坚实。

有几位自费生办妥了托运手续，准备去登机了。他们没有眼泪，没有离别的愁绪，站在安全门内，充满自信和自豪，挥手向亲友告别。但是，在安全门外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他们的父母或妻儿，以泪洗面。千嘱咐，万叮咛，唯恐这一别离成了永诀。这种强烈的反差只有在我们自费留

学生别离的场面中才会出现。有一个自费生满不在乎地叫道：哭什么，回去吧，我又不是去插队落户！

又一个不以为然地说：早知道你们会哭，就不让你们来送了！

又一个笑吟吟地说：再见了，等我的好消息。

他们在一片呜咽声中，满面笑容，神采奕奕，轻松自如地去登机了。

走了几个，又来几个，大半都是这样告别了亲朋好友、妻儿老小。

我们是幸运的，自费留学不知从哪年哪月起，已是扒分发财的代名词了，我们从办留学手续的那一刻起，就已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阶层，我们在羡慕的目光中，获得了自豪和自信。尽管这种自豪和自信极其盲目，毫无价值，但这是我们东方骄子的需要。

王默目睹这种离别的场面，不冷不热地笑了几声，笑得我冷嗖嗖的。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自豪和自信同样占据着我的灵魂。当然，我没他们这样坚强，几次、十几次地回眸安全门外的林林和冬冬。自豪和自信使我抑制“人性”，一转身，隐没在妻儿的视线之外，显示我的坚强。虽然我为了出国债台高筑，忧心如焚，但是自豪和自信促使我伪装得若无其事，胸有成竹。

“祝月，”过了一会儿，王默对我说，“我和东京的朋友赵乾通过电话了，机场可能没人接。”

我愣了愣，怀疑这话是从王默嘴里说出来的。我定了定神说：“老兄，你在开玩笑？”

“赵乾工作太忙，有可能去机场接你，也可能在班车终

点接你。”王默说。

我冷了半截。原先双方说得好好的，我付一万二千元人民币（抵当时黑市价三十五万日元），我从没谋过面的王默的朋友的朋友赵乾负责机场迎接，落实住宿，给份工作，所谓的“实行三包”；八千元，什么都不包，办妥三证之后，全由自己负责。

没门路出国的，别无选择，只有拿钱去撞击通向留学的大门。

我选择了一万二千元人民币这块敲门砖。并不是我富有。如果早在七、八年前的话，为了省四千元，我宁可冒次风险。那时，我还是个单身汉，没有牵挂。现在不同了，我三十三岁了，成家了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冬冬，为了我自己，我愿意高筑债台，图个顺利，去日本再拼搏。

我诚惶诚恐地望着王默，说他什么好呢？他是位热心的朋友，他是通过他朋友的朋友赵乾帮我办妥留学手续的。过去，我从来没想过留学。我的留学之事是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中谈成的。

三个月前，我托王默在机场商店买条外烟。热心的王默给我烟时，问我是不是想去日本留学，说他可以帮忙。第二天，和妻子林林商量后，我就决定请他办留学手续。那么匆忙，又那么简单，没有一张契约，几句话便谈妥了一万二千元的买卖。

我绝对信任相交十年的王默。即便是现在，迎接地点改变了，我虽然冷了半截，但还是信任王默。

“祝月，班车终点站就是新宿，去那儿很方便，象虹桥机场到延安东路售票处。”王默说，他在安慰我。他从未出

过国，却在安慰将要出国的我。

事到如今，尽管心里赌气，脸上却尽可能隐藏不悦之色，不使王默为难。人是要劝慰自己的，尤其在逆境中，更要为朋友着想，只有这样，才交得久朋友。

此时，王默去找他同事了。不去打招呼，我的三只行李箱没法上飞机，我的口袋已空空如也。过了好久，王默急冲冲赶来了，说他的同事还没上班。运气不佳，我只好拎着行李过磅秤。王默站一边。机场规定机场人员不能帮乘客提行李，这不怪他。但是，磅秤显示数吓了我一跳，托运员开了一张七百二十五元的超重单。我无法想象这七百多元从哪来？向谁要？我已身无分文，林林的口袋里只有二十多元了，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七天，他们母子俩还得生存。唯一的办法是扔掉点东西。然而，行李箱里的东西都是我去东京生活的必需品，是我生存的基石，

“我帮你付了。”王默慷慨地给了我钱，付了超重费，我的三只行李箱这才从运转的运输带上，输向 901 航班。

“太谢谢你了，王默，如有好运，一定重谢！”我忘却了不快，激动地说。

“快去跟妻儿告别吧。”王默说，“我该上班了。”

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我和王默来到了国门口，这是真正的离别了，一转身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相见。我抑制住离别的伤感，望着抱着五岁冬冬的林林，她的泪水一层层地从眼眶里涌了出来，她的身边站着白洁，冬冬的钢琴老师。

“别哭了，回去吧。”我鼻头酸酸的，脑子里塞满铅砂似的，觉得眼眶里似乎也有什么东西粘住了。我握紧拳头，

抑制情感的宣泄，不能让别人取笑我这个彪形大汉。我咬着牙根，颤颤地说：“回去吧。白洁，你劝劝林林，平时烦劳你照顾了，我一到东京，就帮你办留学手续，麻烦你照顾我家里。”

“祝月，你放心去，我会的。”白洁说。

“快跟爸爸再见！”林林握着冬冬的手挥着，但她脸上的泪水却象瀑布一样倾泻下来。冬冬没说半句，一下抱住了林林。

离别何止是痛苦，那依恋不舍的情感简直撕心裂肺。早知如此，我决不东渡扶桑，受那份情感的煎熬。我一咬牙，说了声再见，一转身和王默走向候机厅。

“祝月，我不送你了，”王默停住了脚步，若无其事地摸了摸下巴说，“东京香烟很贵，机场有免税香烟，凭护照可以买两条。”

“多谢了！”我为他的热情而感动。“这七百二十五元，我会尽快还你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王默凄然一笑，忽地阴沉了脸，努动了几下嘴唇，却没说什么。

“王默，你有什么尽管吩咐，我一定帮忙。”我以为他要托我在东京买什么家电商品。

“没什么。”王默想了想，从上衣里摸出一张纸条，说：“祝月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说吧。朋友一场，这点交情总是有的吧。”我轻松地说。

“这是赵乾的地址，如果……如果他没去机场，也没去新宿接你，你自己拿地址去找。”王默说。

我似乎从峰巅掉下山谷，摔得半死不活半天转不过神来。这不是去北京，这是去东京，一个完完全全陌生的世界！

“王默，赵乾是你朋友的朋友，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，人地两生，我又不会说日语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“祝月，你别急，这是有备无患，他会去接你的。”

“他来接我，为什么给你地址？这分明叫我找去嘛。王默，你说实话。”

“祝月，赵乾会接你的，我上班了，再见了。”

王默似乎逃避什么小跑着走了。这就是我相信他如同相信自己的朋友。为什么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呢？为什么恰恰在我踏出国门后才让我知道？为什么等我登高之后，他又抽走了那架寄托我全家命运的梯子？人啊，为什么这样残忍！

我不知所措，象根木头站在红道区的中央。往前走，可怕的噩运在等着我；往后走，那儿有林林和冬冬，但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向他们坦露真情，只会加重他们的负担，家里的所有家当，只能抵偿所欠债务的一半。进是魔窟，退又是深渊。我的精神快崩溃了，发疯似地想喊想叫，想抓住王默问个水落石出。可他上班去了。

红道区的旅客越来越少，宽广的大厅象间可怕的殡仪馆。机场播音员播送着：901航班的旅客请上飞机，901航班……

飞机穿云破雾，平稳地飞行。

豪华的机舱内，左右两边各两个座，中间八个座。我坐在中间排的左侧。901航班的乘客几乎是清一色的象我

一样的自费留学生。我们都处在同一地平线上了，曾经被人高高捧起的身价，被鼓起的自信，被人颂扬而烧沸的自以为是的又毫无价值的自豪，此时此刻统统逃遁得无影无踪。每一个人都将是异国的过客；每一个人都绷紧了脸，茫然若失，默默地为自己的命运担忧。机舱里出奇地寂静。

飞机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的前排有个姑娘呕吐起来，时断时续地飘来难闻的气味。坐在她右侧的男青年站了起来，问哪位带了清凉油。我走了过去，把一盒清凉油交给呕吐的姑娘，她连声说几句谢谢，又呕吐起来。

我坐回自己的座位上，两人座上那位瘦瘦的男青年朝我瞥了一眼问：“看你这么轻松，想必东京有熟人。机场有人接吗？”

“难说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新宿有人接。”瘦子说。我前排的那个胖胖的男青年也插话了：“我也去新宿，去新宿怎么走？”

“我又没去过怎么知道。喂，我们三个人包辆轿车去，怎么样？”瘦子说。

“我没意见。”我巴不得有这样的伙伴。

“我也没意见。”胖子说，“还有哪位肯加入我们行列的，我们包车去新宿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有人说。

“我也去。”又有人说。

“那好，我们包辆面包车，这样价钱便宜些。”瘦子高兴地站了起来。

一时间，机舱内喧闹起来，说工作，说住宿，说机场新宿有没有人接，议论纷纷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机舱内再度寂静下来。

901 航班经过两个小时四十五分的航行，终于平稳顺利地降落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。

## 二

机场没人接。

我那三只行李箱象座小山堆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门口。我等了三个小时，班车来了一班又一班，仍然没人来认领我这个弃物。

瘦子和胖子他们，一下飞机早已忘却了“君子协议”，象盘散沙，各奔东西。

又一班从上海飞来的满载自费留学生的 902 班机抵达成田国际机场。我幼稚地幻想着从“上海生”中寻找认识的朋友，彼此好有个心灵的呼应。没有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

再无望地等下去，等到天黑，赵乾也不会来接我的。今天，再没有从上海飞来的航班了。我摸了摸口袋，仅有的一万元日币在机场免税商店买了两条外烟，已用去了两千八百元。我是贪它便宜才买的。在上海这座城市，凡有什么便宜的东西，你会鬼使神差地被吸引过去，谁都不会错过享受便宜的机会。

当初从中国银行兑换这一万元日币的时候，当它是张“百万英镑”，但我站在机场班车售票处时，我的手在发抖，我的心在震颤——一张从机场到新宿的班车票，二千七百元。这张可怜的“百万英镑”就象我这样不值钱，似乎还没动用，就失去了大半的价值。如果新宿还没人接，那可怎么办？

自费留学，那是项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。一个平民百姓想要完成这一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，谈何容易。就这筹款一项，导演了多少人间悲喜剧。有的为了筹款，贪污受贿；有的为筹款，走私盗窃；有的为筹款，掠夺家产，或者东借西凑；有些人，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努力筹措了款项，却被留学文化掳客或者黄牛从中榨干了食。

我是幸运的。我有那些兄弟一样的朋友，凭着我的人缘，打几个招呼，如愿已偿了。但是，筹款之后，焦急地等候绿衣天使送来入学证书和担保人的文书，那种焦急等待的滋味也极不好受。接着，就为办护照忙忙碌碌，忙过之后，又得等护照，护照发下来，又开始进入茶饭无味，日夜难眠的日子。心象吊在树上似的，翘望日本国的签证。签证下不来，无法出国，一万二千元的手续费就白白地扔进黄浦江。

所以，敢于办自费留学的人是条好汉。但更象个赌棍。出巨额赌资的歇斯底里的赌棍。

我便是这样一个赌棍。也略有区别——我是在尚未弄清自费留学是个复杂而又庞大工程的实质的时候，便象头野马，误入了火阵。

我赌赢了签证，然而当我依然是个债务累累的输家时，

却遭到了别人的遗弃，呼爹哭娘都不灵，人地两生，举目无亲，语言不通，单枪匹马，站在成田国际机场，心灰意冷。

我一咬牙，毅然地买了班车票，穿着制服的机场服务生，把我的三只行李箱放进了大巴士座位底下的车舱内，我上了豪华的班车。

班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，停靠在一条宽阔的马路边上。新宿到了。

新宿，东京的一个区域的中心。那一幢幢直入云霄的摩天大楼，显得非常壮观，一列列在高架桥上飞驶而过的列车，象小孩子玩的汽车一样忽地驶来，忽地驶去。宽阔的行车道上，各式种类各种颜色的汽车密密麻麻，来回穿梭。

新宿是个雄伟壮观气势不凡的地方，可此刻不是我赏心悦目的时候。我在茫茫人海中，寻找赵乾，希望他能把我接进一个温暖小屋，请我吃顿饭，洗个澡，泡杯咖啡，聊上一会儿，随后，安排一个适合我的工作，边工作边上学，在这个人间天堂，痛痛快快地享受一番。

不是吗？我不就是为了这些才毅然加入赌棍的行列的吗？

下车后，取了行李，我站在地铁商场的出口处。出乎意料，有三五个和我同航班的上海留学生，仍然驻足新宿。他们反倒为我的出现感到非常惊奇。

“我以为你被人接走了。”那个瘦子说，“三个多小时，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在机场，你们不是说包辆面包车的吗？”我苦涩地说。

“我也没办法，下了车，各管各了，上海人就是这样，你也别奇怪。”瘦子说。

“那个胖子呢？”我问。

“嗨，别提了，这个上海人垃圾瘪三！”瘦子摇摇头，哀声叹气地说，“在班车上说好的，我没人接，他把我带上；他没人接，我把他带上。他被人接走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这种人还是人吗！”

“你不能怪他，要怪怪那些掮客，他们来接我们，不就没事了。”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姑娘说。飞机上她坐在那个呕吐的姑娘的左侧。

“女同胞，那个呕吐的姑娘呢？”我问。

“你是不是想找她要回清凉油？你别要了，我看这个姑娘身体有病，吐出来的东西黄黄的。她一到新宿，有人接她走了。”姑娘说。

“你们自身难保，还关心别人，我急得要去上吊了。”瘦子一脸苦相，扔了刚吸半根的烟又说：“白等了四个小时，抓住掮客，非揍他一顿。”

“你别急，要怪先怪自己。”我说。

“怪自己？怪啥自己？”姑娘冲着我说，“办留学的时候，说得花好桃好样样好，死人听了也会活过来，这能怪自己吗？你这个憨大。”

我是憨得不转弯，被人蒙骗，还怪自己。可我怪自己是为了消消怒气。在同病相怜的弃物面前，连这点可怜的出气方法也犯了天怒。上海姑娘的嘴巴是厉害。

班车开走了，又来一班。又是一车的“上海生”。每班班车驶进车站的时候，有人被立即接走；有的象我这样，成

了弃物。这种人对我刺激更大。他们一个个焦急万分，东张西望，捶胸顿足，一旦有人来接了，那份东方人的自豪又驱使他们昂起头，挺起身，朝我们投来轻蔑的目光，展示他们的幸运。我很怕和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人打交道。我怕他们被人“认领”之后的目光和神态。我希望他们最好象我一样，也永远站在新宿街头，那种目光和言行也许就会永远地消失。

班车又来了。我又“拎起”了幼稚的幻想。我感到这不是幻想，我有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。在上海出入境办事处、上海日本领事馆门口，我和他们聊过几回，大家都在办手续，该办成的大约就这些天成行。有个朋友还留了东京的地址，人未成行，他在香港的舅舅帮他借好东京的房子。他说过，到东京后，可以找他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我们共有八个这样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，曾发过誓，大家抱成一团，携手共进。

我坐在地铁商场出口处的台阶上，盯着从车门下来的每一个人。有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，我似曾相识，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碰见过。他锁好行李，朝我这边挥着手。我忽然兴奋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朝他挥手。他拉着行李箱挤过人群，走过来了。我的心凉透了——他的目光一直对视着我身边那位三十来岁的穿牛仔褲的青年人。

我伤心之极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又觉得遭到这个小青年的作弄和嘲讽。这不能怪他，是我的幻想超出平常的限度，我的想象已经使我不能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。否则，不会轻易把一个陌生人的挥手，当作我的救星。我一点都不认识这个年轻人。